

吉隆坡中华独中发展的社会资本

The Social Capit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Kuala Lumpur

陈梓权*

(TANG Zhi Quan)

吴益婷**

(NGU Ik Tien)

摘要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自十九世纪末就与传统华人会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在学校的创建、资金来源与办学方针上，会馆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马来亚自1957年独立后，迄今许多华校仍然仰赖会馆的支持，不仅华文独立中学如此，华文小学和接受改制的国民中学亦然。本文试图以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来探讨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和吉隆坡中华独中的关系。本文会集中讨论吉隆坡中华独中里以福建人为主的社会资本如何为学校获取如经费、校地、社会网络等各种资源。社会资本作为一项生产性的资本，让学校能够维持并且持续发展。本文运用了社会资本的视角如信任、社会网络、互惠互利、集体行动来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吉隆坡中华独中继承了中华学校以福建会馆这个地缘性会馆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随着非福建人的加入，中华独中的社会资本从原本以福建人为主的黏合性社会资本发展成了连接性社会资本。

关键词：社会资本、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吉隆坡中华独中、华文教育

Abstract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has formed an indelible bond with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Chinese schools' establishment, funding sources, and school policies.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in 1957, many Chinese schools in Malaysia, including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and national-type secondary schools have continued to rely on the support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Hokkien Association and Kuala Lumpur 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by using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as analysis tool.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the Hokkien-based social capital solicited funds, acquired school land, extended networks, and other resources for the Kuala Lumpur 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As a productive capital, social capital enables the school to maintain and thrive. This article uses the concepts

* 陈梓权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生。电邮地址：quan0409@live.com.my

** 吴益婷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电邮地址：tngu@um.edu.my

in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such as trust, social network, mutual benefi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Hokkien Associ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has inherited the social capital that had formed using the Hokkien Association as a carrier. The bonding social capital in Chong Hwa High School has developed into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after non-Hokkiens join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school.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Hokkien Association, Chong Hwa High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前言

二十世纪初，东南亚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且相互关联的现象。华人社团以及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会馆、庙宇、姓氏组织等华人社团组织都与华文教育有很大的关联。这些组织不止创建、维持和发展学校，也提供各种学生福利如设立了各种奖助学金让华人子弟能够接受华文教育。通过翻阅华文学校的校史，我们发现华文学校与华人会馆拥有密切的关系。然而，鲜少有学者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会馆作为华人社会资本的载体是如何为华校形成一股前进的推动力？而这种社会资本发展到今天究竟有什么变化？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以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与吉隆坡中华独中之间的关系，以勾勒出吉隆坡中华独中以福建人为主的社会资本如何为学校获得各种资源，让学校能够维持并持续发展。除此之外，笔者也会说明中华独中的社会资本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所产生的演变。

本文涵盖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笔者将会简单介绍会馆作为华人社会重要的组织与华文学校的关系，另外也会探讨华商作为会馆的领导层在华校的创办和发展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二个部分则会通过对布尔迪厄和帕特南等理论家的研究来阐述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特点及功能。第三个部分则会把社会资本放在华人社会的框架里进行讨论，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一个工具来分析华校的发展动力。第四个部分则把焦点放在作为雪兰莪福建社群的主要机构——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以及吉隆坡中华独中的历史及概况。最后的部分则会探讨中华独中社会资本的发展及演变。

一、会馆与华校

大批华人移民至南洋地区后，来自同一个地域、使用同一种方言的新马华人，往往都会聚集在一起（颜清湟 1991：33）。由于大多数中国移民带着强烈的地方观念到达新马地区，为了安全、娱乐和互助起见，操同一方言者便很自然地会和谐地聚集在一起。这就为新马地区早期方言组织的创立提供了条件（颜清湟 1991：35）。研究会馆的吴华认为会馆的创立是因为早期华族移民离乡背井，远居外地，既无本国政府作为后盾，也无当地政府的扶掖，只得和衷共济，自力更生，而会馆便是他们联络乡谊，促进感情，守望相助，排解纷争的所在（吴华 1980：1-2）。在成立了庙宇，宗亲会、会馆等组织后，重视教育的观念使华人纷纷在其聚集的地方建立起了华校，向自

己的子弟传播祖先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郑良树 1998：6）。这个发展也说明华人社会已经出现第二代，也是一种落户和定居的初期表现。

作为马来西亚华社其中的三大支柱¹，会馆与华校在华人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良树教授认为建立华校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力量是各类型的华人会馆。华人会馆对华校的创办和资助上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直到现在依旧发挥着影响力（郑良树 1998：193）。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各方言群开始创立华文学校，延聘教师，让各帮群的子弟上学读书。除了在教学媒介语是使用该方言群的方言之外，入学的学生也仅限于该方言群的子弟。另外，这些学校通常是附设于各帮会馆或其活动中心之内（颜清煌 1991：279）。这种由方言群各别设立的学校既有限制也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因为语言的限制，当时的帮派观念特重也造成了这些华人子弟并不会到其他方言群所创办的学校上课。各个方言群之间如此清楚的界限使到各个会馆都会为自己的族群子弟设立学校，提供教育。

兴学办教一直都是华人会馆重要的功能之一，华人会馆在华文教育的发展与演变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这不仅包括了会馆在华校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地位，会馆也在为学校提供财政上的资助到试图向有关当局争取有利于华校发展的政策上做出了种种的努力（刘宏 2003：130）。正是由于会馆不遗余力的努力，让华校在马来西亚得以维持并持续发展。

新马华人社会的领袖都是由华商担任。这些富裕的资本家都能获得领导地位，并且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所以，当各方言和宗亲组织要选出各自的领导者时，富有的人很容易当选（颜清煌 1991：137）。这些富人也同时会在不同的社团担任重要的职位，进而产生执事关联²的现象（李亦园 1985：125）。若我们翻查华校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大多数的华校都是由华商创办的。这些华商也会担任学校的董事的职位。至今，华校的董事还是以华商为主。以吉隆坡的独中为例，中华独中的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林景清是建筑公司的董事经理，而坤成独中的董事长是被誉为“马来西亚钢铁大王”的丹斯里拿督斯里锺廷森。

会馆之所以能够对教育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除了其支持华人传统这一历史遗产因素之外，也与会馆领袖和成员之间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华社领导人的商人，他们对华文教育与文化事业持续不断地支持，不止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领导地位，也间接地让他们的商业受益。从普通会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教育活动的支持不仅体现了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并且可以促进华人族群内部的凝集力与认同感（刘宏 2003：130）。

会馆-学校-华商这三位一体的互动格局也进一步加强了华人族群内部的团结以及华人的文化认同感（刘宏 2003：122）。这也证明了会馆与华校拥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因此，本文将会通过由吉隆坡福建社群所创办及支持的中华独中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社会资本作为华校发展的动力。

¹ 华人会馆，华校以及华文报纸被称为马来西亚华社的三大支柱。

² 数个社团聘用同一人士为董事、理事或重要职员的现象。

二、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³

法国著名学者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认为, 世界上存在三种形式的资本: 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 其中: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 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 或换句话说, 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 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 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布尔迪厄也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文化或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转换模式 (布尔迪厄1997: 189-201)。因此, 社会资本是一种在体制化的社会网络中产生并且可以积累的资源。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Coleman) 对社会资本有进了一步的研究。他突出了其功能及形式。他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集体和组织中一起工作的能力。社会资本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它“是由其功能来定义。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实体, 而是包括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这些实体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 并有利于处于该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 能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他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三种主要形式: 义务与期盼 (这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可信赖程度)、社会结构中的信息流动能力以及社会认可的相关标准 (科尔曼 1990: 351-376)。

美国政治学者帕特南 (Robert D. Putnam) 则认为所谓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其产生的互惠互利和互相信赖的规范。他认为, 作为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与公民美德、互惠信任、社会合作、集体归属感和集体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帕特南也提出了关注自身为重点, 倾向于强调小团体的地位的黏合性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和其眼光向外看, 包容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的连接性社会资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等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帕特南认为连接性社会资本可以被称为兼容性 (inclusive) 社会资本而黏合性社会资本也可以被称为排他性 (exclusive) 的社会资本。他认为黏合性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强特定的互惠原则和成员间的团结, 而连接性社会资本能更好地连接外部的资产。黏合性社会关系有助于保持现状, 连接性社会关系有助于获得更多。此外, 他也认为连接性社会资本可以产生出更广泛的互惠规则, 而黏合性社会资本则会使人们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帕特南 2011: 7-13)。

虽然各个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和研究, 但信任、互助、社会网络、规范和生产性的行为都是这些学者所注重的。另外, 这些学者把社会资本放在自愿性社团、组织或某一种团体⁴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并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加强人们在集体和组织中一起工作的能力。通过社会资本, 也可以提高组织社会的效率进而使到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

³ 社会资本是在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研究社会网络的理论。

⁴ 如家长教师协会, 兄弟会及保龄球协会等等。

三、华人社会里的社会资本

笔者在上一节探讨的社会资本是源自西方社会的理论，但目前已经有学者运用社会资本对东南亚的华商进行研究。其中，刘宏（2000）通过运用社会资本来研究唐裕的跨国商业网络。作者认为唐裕通过参加地缘性会馆以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此外，龙坚（2013）在他的研究里说明了新加坡老一辈的华商会透过血缘，亲缘和地缘等社会关系来获取社会资本。

在一本有关泰国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丹尼·乌格(Danny Unger)认为泰族和华人移民在社会资本上有着不同的天赋。华人拥有的社交性和社会资本比泰族更强。作者认为华人通过积极参与跨国业务中多重的社会网络，克服市场上的困境。他们通过自愿团体等合作机构的网络帮助他们克服由泰国国家的软弱所带来的障碍。相反的，泰人却较少参与家族之外的合作组织。他们通常不愿意为团体和共同利益作出贡献(Unger 1998: 58-169)。

在上一节我们看到西方学者们都把社会资本放在自愿性团体和组织里进行讨论，因此笔者会把焦点放在作为华人社会里最重要的组织——华人会馆里进行论述。

移民到南洋的华人基于地缘、业缘、血缘和神缘等因素，建立了血缘性社团，地缘性会馆、神庙和行业公会等等。早期的华人社团组织多为地缘为纽带的会馆，次之则是神缘会、宗亲会和业缘会，但后三者仍有强烈的地缘色彩（庄国土 2010: 5）。再加上南来的华人社会的同宗人数远非同乡人数可比，力量上也因此悬殊（吴华 2017: 2）。因此本文会把焦点再进一步缩小，聚焦在地缘性会馆⁵。

会馆作为华人社会里最重要的组织，也成为了华人建立并积累社会资本的地方。社会资本对移民到马来亚的华人是很重要的。来自贫困家庭并且教育程度低落的他们往往都缺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以他们只能依靠社会资本。因此，他们通常都会加入地缘性会馆。

地缘性会馆里的会员基本上都是同一方言群的人，他们之间也有很强的信任。商人往往都会从会馆招募伙计和学徒，这其实暗喻着同乡之间存在着信任（麦留芳 2017: 39），这同时也说明了同个方言群为什么会垄断某个行业。另外，当这些华人参加了会馆，他们就拥有了会馆会员的身份。作为地缘性会馆的会员，他们通常也是来自相同地区或操相同方言的。因此，他们有了同乡关系并且属于同个方言群。他们也会参加会馆的各种活动如祭祀活动和会议，有些华人甚至在会馆里谈生意。这说明了会馆也是华人建立社会网络的地方。除此之外，会馆的成立也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作用上，这可以从会馆的功能上来判断。会馆拥有照顾同乡，为会员谋福利，以及提供膜拜场所和葬地功能（颜清煌 1991: 41-48）。

张侃（2004）认为华人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场所是各种会馆和社团组织。它们既是社教中心，又是培养友情和人际关系的场所，也创造了许多做生意的机会，同时从中产生一些具有社会威望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通常是商人，他们同时也担任会馆的领袖。因此笔者将会讨论华商里所存在的社会资本。研究华商的学者普遍认为信用和关

⁵ 马来西亚第一间地缘性会馆是于1801年创立的檳城嘉应会馆（仁和公司）。

系是华商崛起的重要因素(Chin 2005: 137-156)。信用对于一位华商是很重要的,若一位华商没有信用,他将无法在商界上立足。另外,关系对于华商也很重要,颜清湟(2010)认为从海外华人社会的环境来考察,宗亲、乡亲和同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早期华人移民的模式更是加强了血缘和地缘的纽带。这些海外华商都认为这些传统的社会关系对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华商之间也存在着互惠的原则。华商会通过自己的商业网络进行资讯交流、拓展业务和进行交易(龙登高 2006: 137-138)。这也可以让华商们各取所需进而达到双赢的局面。颜清湟(2010)则认为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有效运作的一些要素来自传统文化如信用、关系、互惠和面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要素与来自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本是有共同点的。通过社会资本,华商可以减少生意成本、建立商业网络和获得重要的情报,进而拓展自己的生意。

综合以上所述,华人社会确实存在着社会资本。会馆作为华人社会资本的载体(丁丽兴 2010: 11-31)对华人社会的政经文教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和他提出的黏合性社会资本和连接性社会资本两种不同的社会资本的类别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福建会馆和中华独中这两个拥有密切横向关系的组织的社会资本。笔者认为,中华独中因延续了中华学校早期由福建人和福建会馆形成的社会资本符合了帕特南所提出的黏合性社会资本。但是这种情况在非福建人和非福建人所成立的组织加入学校的董事会后产生了变化,从原有的黏合性社会资本进而转换成连接性社会资本。

四、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与吉隆坡中华学校

当华人移民到马来亚,为了本身的安全、娱乐及互助起见,操相同方言的华人会聚集在一起。这为方言会馆的创立提供了条件(颜清湟 1991: 35)。吉隆坡的福建人也是如此,他们在1885年创办了福建公司,随后改名为雪兰莪福建会馆。2007年该会馆修改章程,再度易名为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以下简称福建会馆)。

会馆特刊上记载,“乡先贤创始之日即在吉隆坡谐街七号延聘敦师,设馆授徒,名为福建公司,同乡子弟始能获得受中华文化之熏陶…”。福建会馆成立的宗旨是联络同乡感情、增进同乡福利、发挥互助精神、办理慈善正益、振兴文化事业(雪兰莪福建会馆 1985: 19)。此外,福建会馆也负责管理威镇宫和福建义山,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社群组织,有力地维护了福建社群的团结,扮演了凝集福建人的角色(宋燕鹏 2019: 16)。

此外,福建会馆也与吉隆坡中华学校有关系。根据校史记载,中华学校是由叶养骞、黄重吉、洪启读、陈炳坊、叶燕峇、谢建午、曾兴汉、林伟如和蔡清海集议在文良港创办的(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 30)。笔者根据雪兰莪福建会馆历届董事的名单进行比对,得出叶养骞(?-1952)、黄重吉(1892-1966)、洪启读(1875-1960)、陈炳坊和谢建午均是福建会馆的董事。中华学校的九位创办人里有五位是福建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吉隆坡中华学校虽然不是直接由福建会馆创办,但却是由福建会馆

的领袖于1919年创办的（吉隆坡文良港中华小学 2019：10）。他们不但是著名商家，也曾担任多个主要社团之领导人、雪兰莪福建会馆及中华学校的董事。

福建领袖接着也在1939年增办了吉隆坡中华中学。1939年，共有25位闽侨领袖致函雪兰莪福建会馆直辖国民学校，中华学校、中华女校三校董事联合会建议中华学校在小学的基础上增办中学。根据增办中学委员会的名单来看，杨兆琰、颜滂祐、叶养骞、陈喜启、黄重吉、洪进聪、刘治国、洪启读、黄和先、张朝源、戴文郁、姚金榜、陈仁坝、黄秋舫、陈祯祥、黄振秀、叶阿守、刘庭前、林世吟、陈云祯和杜崇文（不注作者，1939年6月23日）等二十一人都是福建会馆的董事成员，因此可以推断他们都是福建人。由此可见，福建人在中华学校的发展上扮演着主导地位。中华中学接着在1961年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当时的董事又成立了独立中学。另外，福建会馆也与国民学校（目前已关闭）和中华女校有联系（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2010：107-109）。

1945年，三校董事联合会⁶召开赞助人大会一致议决将三校送请福建会馆办理。1976年6月10日，中华中学、中华小学、中华女校、国民学校在赞助人大会上通过将四校产业割予福建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 1985：95-308）。这四所学校的校产在经过赞助人大会讨论后托付于福建会馆所成立的“雪兰莪福建会馆非营利有限公司名下”。这些董事认为华校产业由华社团体掌管，可确保民族事业根基稳固（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2010：28）。

福建会馆的领袖们不但是学校的创办人，他们同时也是学校的董事。在学校的领导与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五、吉隆坡中华独中发展的社会资本

兴学办教一直以来都是会馆的重要功能，许多学校都是由会馆创办并给予支持⁷。郑良树（1978）则认为创办学校作为会馆的“馆内活动”，至今还发挥着其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因此笔者将在本节以中华独中作为例子探讨以福建人为主的社会资本如何为学校带来各种资源，让中华独中得以维持及发展。

福建人一开始在以客家人及广府人为主的雪兰莪的人数并不多。直到1884年，英国政府为了替吉隆坡引进更多的资本，有意将以广、客人士掌控的餉码承包权转让给来自檳城的福建人。但在遭到客家人和广府人反对后才改为让客家、广府和福建人一起承包。这不仅打破了餉码被广、客人士牢牢掌控的局面，也表示着大量的福建人移入吉隆坡的开始（J.M.Gullick 2000：79）。这也为福建社群获得社会资本提供了制度化的空间。

由于雪兰莪的福建人越来越多，因此雪兰莪福建人的核心组织雪兰莪福建会馆于1885年成立了。福建会馆不仅是雪兰莪福建社群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场所，也扮演了团结雪兰莪福建社群的角色。通过表1和表3我们观察到这些大多数为商人的福建人（王付兵 2012：173-180）集中地聚集在吉隆坡、巴生、瓜拉冷岳和瓜拉雪兰莪这几个地方。虽然福建人在瓜拉冷岳、巴生县、瓜拉雪兰莪的人口里拥有很高的比例，但如表1所示，

⁶ 中华学校、中华女校和国民学校在1937年成立了三校董事联合会。

⁷ 见郑良树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

仅凭人数而言，吉隆坡县和吉隆坡市相较于其他地区拥有更多的福建人。这种集居在一起的现象让雪兰莪的福建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网络，并逐步形成社会资本。而福建会馆则成为了他们积累并储存社会资本的地方。

表1：雪兰莪州内福建方言群人口数量1891-1947

年份	巴生县	瓜拉雪兰莪	瓜拉冷岳	乌鲁冷岳	乌鲁雪兰莪	吉隆坡县	沙白安南
1891	327	542	18	253	501	2,883	-
1911	4,980	1,657	2,086	2,283	5,787	12,448	-
1947	24,194	10,907	16,288	8,805	7,963	38,833	1,483

表2：雪兰莪州内华人人口总数1891-1947

年份	巴生县	瓜拉雪兰莪	瓜拉冷岳	乌鲁冷岳	乌鲁雪兰莪	吉隆坡县	沙白安南	总华人人口
1891	1,795	1,196	1,278	4,664	7,442	34,469	-	50,844
1911	10,503	3,035	4,611	12,618	29,206	90,935	-	150,908
1947	44,110	15,774	26,154	34,669	41,519	194,454	6,030	362,710

表3：雪兰莪州内福建方言群人口巴仙率1891-1947

年份	巴生县	瓜拉雪兰莪	瓜拉冷岳	乌鲁冷岳	乌鲁雪兰莪	吉隆坡县	沙白安南
1891	18.2	45.3	1.4	5.42	6.73	8.36	-
1911	47.4	54.6	45.2	18.1	19.8	13.7	-
1947	54.8	69.1	62.3	25.4	19.2	19.9	24.6

资料来源：

1. Government of Selangor. (1891). *Selangor Government Gazette*. Kuala Lumpur.pp. 957.
2. A.M Pountney. (1911).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Review of the census operations and results including tables exhibiting the population by sex, age, race, birthplace, religion and occupation*. London Darling & Son Ltd.pp.119-120.
3. M. V. Del Tufo.(1949). *Malaya, comprising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Governments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随着福建会馆、福建义山和福建人的庙宇威镇宫的成立，福建人的学校-中华学校也在1919年成立了。中华学校虽然是由福建人创办的，但这些福建领袖们一开始也不标榜以会馆名义办校（林德顺 2019：326）。但由于中华学校的创办人和董事大多是福建会馆的领袖，因此福建会馆才与中华学校产生了联系，后来学校的董事甚至把学校送请会馆办理（雪兰莪福建会馆 1985：95-308）。

作为民办教育，中华学校校地的购置和办学经费的来源都是依靠以福建人为主的董事会成员所出资支持的。然而1930年代因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华学校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作为雪兰莪境内福建人最高组织的福建会馆义不容辞地出面协助中华学校（颜清煌 2017：101）。福建会馆除了在1934年拨款490元赞助中华三校作为联合考试委员

会的经费以外，1935年福建会馆也拨出了一百元为中华学校的经费。1936年会馆按月拨款三十元充当学校的经费。1937年则议决每月拨出四十元予中华学校。另外，中华学校的董事会议大多都在福建会馆举行（雪兰莪福建会馆 1985：52-59）。这些记录都可以在福建会馆的会议记录里找到，因此笔者认为，福建会馆和中华学校的关系从这个时候逐渐开始制度化。

中华学校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⁸后便停办，并在1945年11月1日复办（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31）。长期担任福建会馆董事的黄重吉先生捐了一万元作为学校的复办经费（不注作者，1966年2月12日）。中华学校在战后不久就得以复办，主要依靠的是福建人的支持。根据1946年雪兰莪中华中学复校特刊记载，中华中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董事月捐。因此，中华中学的经费主要还是依靠以福建人为主的董事所资助的。除了捐款以外，中华中学的校地也是由董事捐赠的。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董事的夫人们也出动为学校进行筹款（雪兰莪福建会馆 1985：72）。

作为福建人所创办的学校，中华学校里的董事大都是由福建人组成的。再加上学校坐落于福建人为多数的文良港（林德顺 2019：326），也符合了当时的会馆或领袖会为了自己的同族子弟创办学校的现象（郑良树 1998：194）。中华学校透过以福建人为主的社会资本，得到了来自福建人的大力资助。从校地到校舍，以及学校的经费都是由身为福建人的董事所出资的。另外，这些董事们都肩负起为学校筹款，筹建校舍和为学校向有关当局争取应得的拨款等等的责任。

林德顺（2019）认为福建会馆对中华学校的创办、校舍建设与重建、营运经费、校务经营和主权代表等，皆以自家人办的学校看待。在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下，提供长期的支援。总结来说，中华学校因为有了福建人的社会资本，才得以维持并发展至现在的规模。

中华学校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由福建人为主导的，但这情形在中华小学及中华中学于1958年和1962年接受改制⁹后发生了变化。改制后的中华小学和中华中学成为了政府学校并且成立了新的董事会。

《1961年教育法令》在华社的激烈反对下通过，政府于1962年开始废除部分津贴制度，这表示着马来西亚的华文中学，在新的教育法令下，将会分为接受改制，使用官方语文为教学媒介语并享有政府津贴的国民型中学和不接受改制，也得不到政府津贴的独立中学。中华中学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接受津贴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而下午班因为没有接受津贴，并以独立中学的体制发展，才拥有了现在的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正是因为中华独中与中华学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福建会馆也与中华独中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华学校以福建人为主的社会资本得以在1962年成立的中华独中得到延续及扩大。

中华独中作为民办学校，主要依靠的还是来自华人社会的支持。而福建会馆和福建人正好扮演了这种角色。从中华独中历届董事名单（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81-

⁸ 马来亚在1941-1945遭日本入侵。

⁹ 学校接受政府津贴，改制成为政府学校。

104) 来看,担任学校董事职位的大都是福建人,而他们也同时是福建会馆的董事。福建人也为中华独中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华独中成立至今历经了八任董事长,而这八任董事长都是福建人。如李成枫先生作为中华独中的第三任董事长便为学校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 301-302)。这些福建领袖运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替中华独中与其他社团组织建立起了关系,并为学校获取了所需要的资源。除了福建会馆之外,南安会馆以及以福建人为主的安邦南天宫也加入了学校的董事会里。

另外,福建会馆也会委派代表担任中华独中的董事,因为中华独中的董事会有两席是保留予福建会馆的(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 78)。这表示着中华独中和福建会馆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关系。另外,根据表4,福建会馆差不多每年都会拨款上万令吉予中华独中作为办学经费。笔者认为这种长期与稳定的资助俨然成为一种制度性拨款,让中华独中得以在没有政府的资助下茁壮成长。

表4: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给予吉隆坡中华独中拨款1969-2010

年份	总数	目的
1969	RM 3,000	拨款
1970	RM 60,000	拨款
1971	RM 15,000	拨款
1972	RM 30,000	拨款
1973	RM 90,000	拨款
1974	RM 30,000	拨款
1975	RM 30,000	拨款
1976	RM 30,000	拨款
1977	RM 55,000	拨款
1978	RM 305,000	拨款
1979	RM 90,000	拨款
1980	RM 120,000	拨款
1981	RM 180,000	拨款
1983	RM 120,000	拨款
1984	RM 120,000	拨款
1985	RM 120,000	拨款
1986	RM 30,000	拨款
1987	RM 120,000	增建校舍
1988	RM 120,000	拨款
1994	RM 100,000	拨款
1997	RM 195,794.80	拨款
1998	RM 110,000	拨款
1999	RM 30,000	拨款
2000	RM 50,000	拨款

年份	总数	目的
2001	RM 30,000	拨款
2002	RM 30,000	拨款
2003	RM 30,000	拨款
2004	RM 30,000	拨款
2005	RM 30,000	拨款
2006	RM 30,000	拨款
2007	RM 30,000	拨款
2008	RM 30,000	拨款
2009	RM 37,000	拨款
2010	RM 30,000	拨款

资料来源：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2010，《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页141-143。

1962年，中华中学一分为二。独立中学因学生人数日益增加，迫切需要拥有自己的校舍。这是因为中华独中和中华国中共用校舍，而被逼安排到下午班上课。校方认为学生被安排在下午上课的效率较差，另外两校共用同一校舍，行政及教学皆有不便之处。于是中华独中董事会决定另觅校地建设独立中学校舍以利发展。1969年董事部购得怡保路现有六英亩校地，时价二十二万余元。当时董事会资金仅得十六万，其余七万余元是由福建会馆捐献（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35）。根据校刊记载，中华独中在购置校地的事情上获得了时任董事长尤人俊局绅和董事叶鸿恩、李明德、李统溪及黄茂桐的协力接洽才能够完成（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63）。根据表5，笔者通过与福建会馆1968/1969年年度职员名单对比，得出福建会馆的正文化科长是黄茂桐先生，副文化科长是尤人俊局绅。李明德是正交际科长，叶鸿恩和李统溪则担任董事（雪兰莪福建会馆 1985：372）。这些福建领袖同时在会馆和学校担任董事产生的执事关联让会馆和学校产生了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的领袖在中华独中的发展上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表5：雪兰莪福建会馆和中华独中董事职位对比

姓名	雪兰莪福建会馆1968/1969年年度职员	中华独中1969年度董事会
尤人俊	副文化科长	主席
叶鸿恩	董事	正总务
李明德	正交际课长	监理
李统溪	董事	查账
黄茂桐	正文化科长	董事

资料来源：1.雪兰莪福建会馆，1985，《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页372。

2.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2019，《中华百年校史纪念册》，册四，吉隆坡：吉隆坡中华校友会，页82。

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审视推动中华独中发展的社会资本，笔者认为学校的董事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信任。这是因为他们是学校的董事以外，同时也是会馆的董事。身为商人的福建人董事也具备信用这项特征。他们除了拥有同乡关系以外，也属于会馆的会员，因此董事们具有很强的社会网络。

除此之外，这些董事们也利用了福建会馆的社会网络为学校筹款。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1987年学校为了筹募扩建校舍基金而进行的筹款活动。通过表6，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22个由福建人所创立的社团组织分别捐款给中华独中。这些社团不止涵盖了地缘性会馆，也有姓氏公会。另外，这些社团组织遍布西马半岛的各个州属，证明了雪兰莪福建会馆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

表6：1987年福建社团组织给予中华独中扩建校舍基金的捐款

社团	数额	州属
雪兰莪福建会馆	RM 180,000	雪兰莪
雪兰莪惠安公会	RM 30,000	雪兰莪
雪兰莪南安会馆	RM 5,200	雪兰莪
巴生福建会馆	RM 5,000	雪兰莪
雪兰莪南阳叶氏公会	RM 3,000	雪兰莪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	RM 2,000	马来西亚
乌鲁音峇鲁福建公所	RM 1,000	雪兰莪
巴生雪兰莪桃源俱乐部	RM 500	雪兰莪
吉隆坡雪兰莪龙岩会馆	RM 500	雪兰莪
雪兰莪诏安东山会馆	RM 300	雪兰莪
瓜拉冷岳福建会馆	RM 200	雪兰莪
劳勿福建会馆	RM 200	彭亨
吉兰丹福建会馆	RM 200	吉兰丹
柔佛丰盛港福建会馆	RM 200	柔佛
马来西亚永春周氏公会	RM 100	马来西亚
吉南福建公会	RM 100	吉打
吉中福建会馆	RM 100	吉打
森州马口福建会馆	RM 100	森美兰
柔佛州永春总会	RM 100	柔佛
霹雳和丰福建公会	RM 100	霹雳
丹绒马林永春公会	RM 50	霹雳
霹雳华都牙也福建公会	RM 50	霹雳

资料来源：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1987，《校讯6》，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页71-81。

因中华独中的董事都是具有商人身份，并且拥有地缘关系的福建人，我们可以把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称之为黏合性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由具有相同性质的人所形成的，帕特南把黏合性社会资本比喻成社会学意义上的超级强力胶（帕特南 2011：12）。因此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担任学校的董事是义务性质的，学校董事们还必须投入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他们时常需以身作则捐款以支持学校的运作。为什么这些福建领袖会愿意担任学校的董事呢？这是因为身为会馆和学校的领袖，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肩负某种社会责任。如中华独中第三任董事长李成枫在接受南洋商报的访问时说：“我们办华文独中，纯粹是本着公民良知，以有教无类作出发点，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为社会尽一分绵力，绝对没有居功或其他的意图（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990：149）”。这也符合社会资本里所提到的义务。

另外，身为商人的他们也拥有庞大的财力得以出资捐款。为什么福建会馆的领袖会支持中华学校呢？笔者认为这不仅只是因为中华学校是福建人创办的学校，也充分表示了这些福建领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福建会馆的领袖们才会义不容辞担任此重任。如李成枫所提到的：“我们的主要办学宗旨是在延续六年小学的母语教育，从而保存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990：149）。另外，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我捐钱也捐了十多二十年，但每一次捐钱都是为了民族教育，至今我也算不出我这一生总共捐了多少钱（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995：80）。但这些领袖参与这种社会福利的活动不仅仅是纯粹的利他主义。通过这些活动，这些领袖们得以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间接也为他们的生意带来了好处。这符合了社会资本里所提到的互惠互利的特征。

翻阅中华独中的校史，我们会看到学校为了筹募经费而经常举办各种筹款活动。例如1974年，学校为了建校把募捐组分为树胶商组、建筑商组、矿家组、木商组、砖窑商组、五金商组、铜铁商组、茶商组、出入口商组、汽车零件商组和校友组十二小组让董事和校友们分别向各商家募捐。另外学校也与南洋商报联办“南洋行”义跑为学校筹款（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63-66）。这些筹款活动往往都会出动学校的成员如董事、教师和学生。因此筹款活动可以被视为是一项集体行动。由于办教育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的庞大工程。所以，若由少数个人来支撑一所学校的发展恐怕不会长久。会馆所拥有的能量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远远超过了个体，因此福建会馆正好扮演了这种角色。中华独中的董事们通过福建会馆这制度化的网络，运用积累在会馆里的社会资本，为学校获取了所需要的资源。

中华独中社会资本是以地缘性会馆作为载体，因此中华独中的社会资本是以拥有地缘关系的福建人所形成的。这与西方社会所谈论的社会资本是有区别的。这种以地缘性会馆为载体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符合了华人社会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这种社会资本具有两种特点。第一，这种社会资本拥有很强的凝聚力，并且会对拥有地缘关系和属于同个会馆的福建人产生很强烈的认同感及忠诚感，而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地缘性会馆也加强了他们的凝聚力，进而形成黏合性社会资本。第二，这种社会资本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特点会造成组织拥有某种程度的封闭性。

但是中华独中的社会资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华人社会里的方言群认同逐渐减弱，打破了方言群的隔阂。因此，中华独中除了延续中华学校以福建人为主的社会资本也加入了非福建人的董事和仙四师爷庙等组织。这让学校的社会资本从福建人的社会资本走向华人的社会资本，从黏合性社会资本逐渐走向连接性社会资本。相信此现象会为学校带来正面的发展，减低社会资本对学校的反面影响。

除了以华人为主的传统社会组织如会馆和庙宇委派代表担任学校的董事以外，笔者也观察到非华人传统的社会组织如中华校友会为了能充分了解母校的校务发展与办学方针，¹⁰自1978年也加入了学校的董事会。该会成立的宗旨之一即是关怀母校及支持母校的发展。为了落实此宗旨，该会于1977年成立了助学金小组，以资助母校优秀的清寒学生不致因家境问题而退学。此外，在母校多次筹募建校基金时，该会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外，校友会和校友们也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根据统计，该校友会自1971年成立以来，校友会与校友对母校的捐款超过马币三百万元（古鸿廷 2003：184-185）。校友会的华乐团也在学校的万人宴活动上与学生一起表演为学校筹款（吉隆坡中华独中 2005：173）。由于中华独中自成立以来所招收的学生都是不分畛域的。因此校友会的理事不仅仅只有福建人，也有来自其他方言群的理事。

另外，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经历高度的经济成长，华社以专业人士为主的中产阶级大大增加，因此学校以商人为主的董事会也加入了许多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和大学讲师等等以负责学校的课程发展和教师培训等等的工作。如曾担任学校第四任董事长的苏天明律师和长期担任校务促进委员会主任的林忠强博士。

中华独中社会资本的延续及扩大让中华独中不但可以维持与吉隆坡福建社群历史渊源之外，也让学校可以获得吉隆坡福建社群以外的资源。中华独中则从福建人、福建会馆的产业，成为了华人社会的公共产业。

结语

本文试图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中华独中与福建会馆的关系，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对华校的维持及发展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会馆作为华社社会资本的载体，提供了华校发展所需要的动力。会馆里的社会资本也让华校和会馆的关系制度化，让会馆和会馆里的会员成为了学校的后盾。至今，福建会馆和中华独中依旧保持很好的联系。福建会馆每年也会拨出助学金给该校的学生。当学校举办筹款活动时，福建会馆也会拨款以示支持。

中华独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以福建人为主的社会资本。这些董事之间拥有信任，社会网络及互惠互利的特点，因此提高了办学的效率，让中华独中得以维持并发展。透过社会资本，吉隆坡的福建社群得以凝聚了会馆、会馆会员以及会馆领袖的集体力量，兴学办校以解决福建子弟甚至华人子弟的教育需求，使华文和华人文化得以传承。

中华独中延续至中华学校的社会资本从以地缘性会馆的社会资本，发展到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虽然地缘性会馆依旧在学校的董事会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学校也加入了华人庙宇、华人企业¹¹、校友会等组织形成了以学校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学

¹⁰ 吉隆坡中华校友会是在战后1946年6月9日成立的。但因为客观因素而被停止活动，过后于1971年12月14日再次恢复注册。

¹¹ 如2016-2019年度董事会有王兄弟石油有限公司和廖德水父子建筑有限公司的代表。

校的董事也不仅仅是以商人为主，在现代社会因教育的发达而孕育的专业人士也加入了学校的董事会里为学校的发展出一份力。

中华独中以地缘性会馆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已经发展成以学校为载体的社会资本。中华独中作为华社的公共资产，也是华人社会的内部桥梁，连接了吉隆坡的华人的方言群，扮演了整合方言群的角色，也加强了华人族群内部的团结以及华人的文化认同感。这使到学校不仅能够获得来自吉隆坡福建社群的帮助以外，也获得了来自其他社群或组织的资源。这让学校在进行筹款的时候可以动员的人员增加了。这些组织和董事团结在中华独中的旗帜之下，而社会资本作为润滑剂，形成了一股力量，为学校的发展出一份力。这些组织之间形成的横向关系，在学校的旗帜下紧密合作。王悦（2017）认为当社会横向网络和与之相关的互惠规范在社会成员互动的过程中被不断巩固和发展时，社会资本存量才会不断提高。因此，中华独中作为华人社会资本的载体整合了华社资源、团结华社力量、打破了华人社会涣散的局面，将华商、华人社团、华人庙宇和华人企业等不同力量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办学。正是因为拥有华人社会的社会资本，中华独中才得以从只有百多位学生的学校发展到成为设备齐全并拥有五千多位学生的大型独中。

参考文献

- A.M Pountney (1911).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Review of the census operations and results including tables exhibiting the population by sex, age, race, birthplace, religion and occupation*. London Darling & Son Ltd. pp.119-120.
- Chin Yee Whah (2005). *Budaya dan Keusahawanan Cina di Malaysia*. Bangi: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pp. 137-156.
- Danny Unger (1998).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in Thailand: Fibers, Fi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8-169.
- Government of Selangor (1891). *Selangor Government Gazette*. Kuala Lumpur. pp. 957.
- J.M.Gullick (2000).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7-1939*. Kuala Lumpur: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p.79.
- M.V.Del Tufo (1949). *Malaya, comprising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Governments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 布尔迪厄著、包亚明编译，199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89-201。
- 不注作者，1939，〈吉隆中华学校下学期增办初中并己成立委员会负责办理〉，吉隆坡：南洋商报，1939年6月23日，<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390623-1.2.116?ST=1&AT=search&SortBy=Oldest&k=%E6%B4%AA%E5%95%9F%E8%AE%80%E4%B8%AD%E8%8F%AF%E5%AD%B8%E6%A0%A1&P=14&Display=1&filterS=0&QT=%E6%B4%AA,%E5%95%9F,%E8%AE%80,%E4%B8%AD,%E8%8F%AF,%E5%AD%B8,%E6%A0%A1&oref=article>，阅于2021年11月13日。
- 不注作者，1966，〈首都工商巨子黄重吉逝世〉，吉隆坡：南洋商报，1966年2月12日，<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60212-1.2.27.29?ST=1&AT=search&k=%E9%BB%83%E9%87%8D%E5%90%89%E4%B8%AD%E8%8F%AF%E5%AD%B8%E6%A0%A1&P=5&Display=0&filterS=0&QT=%E9%BB%83,%E9%87%8D,%E5%90%89,%E4%B8%AD,%E8%8F%AF,%E5%AD%B8,%E6%A0%A1&oref=article>，阅于2021年3月15日。

- 丁丽兴, 2010,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华人社团研究>, 收于庄国土、清水纯、潘宏立编, 《近30年来东亚华人社团的新变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页11-31。
- 吉鸿廷, 2003, 《教育与认同: 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页184-185。
-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987, 《校讯6》, 吉隆坡: 中华独立中学, 页71-81。
-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990, 《校讯9》, 吉隆坡: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页149-151。
-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995, 《校讯14》, 吉隆坡: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页80-81。
-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05,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85周年校庆特刊》, 吉隆坡: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页173。
-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19, 《中华百年校史纪念册》, 册四, 吉隆坡: 吉隆坡中华校友会, 页30-302。
- 科尔曼著、邓方译, 2008, 《社会理论的基础》,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351-376。
- 李亦园, 1985, 《一个移殖的市镇: 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 台湾: 正中书局, 页125。
- 林德顺, 2019, <吉隆坡三校与雪隆福建会馆的渊源>, 收于《中华百年校史纪念册》, 册四, 吉隆坡: 吉隆坡中华校友会, 页325-329。
- 刘宏, 2000, <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 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个案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0年第一期, 页1-15。
- 刘宏, 2003,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页109-131。
- 龙登高, 2006, 《中国海外华人生意》, 马来西亚: 大将出版社, 页137-138。
- 龙坚, 2013, 《新加坡华裔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罗伯特·帕特南(R.D.Putnam)著、刘波等译, 2011, 《独自打保龄: 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7-13。
- 麦留芳, 2017, 《百年虚拟帮会》,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页39。
- 宋燕鹏, 2019, 《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 籍贯、组织与认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4-16。
- 王付兵, 2012, 《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1800-1911》, 云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页173-180。
- 王悦, 2017, <社会资本视角下马来西亚华社的内部分离(1990-2013)>, 中国: 《八桂侨刊》, 2017年04期, 页42-52。
- 吴华, 1980, 《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 新加坡: 东南亚研究所, 页1-2。
- 吴华, 2017, <新加坡华族会馆志导论: 新华社会传统组织>, 收于安焕然编《吴华文史选集》, 新山: 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 页1-2。
- 雪兰莪福建会馆, 1985,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 吉隆坡: 雪兰莪福建会馆, 页19-308。
-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2010,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 吉隆坡: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页28-143。
- 颜清煌著、粟明鲜等译, 1991, 《新马华人社会史》,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页33-279。
- 颜清煌, 2010, 《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页163-187。
- 颜清煌, 2017, 《海外华人世界: 族群、人物与政治》,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页101。

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1990，《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351-376。

张侃，2004，〈从社会资本到族群意识：以胡文虎与客家运动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页73-77。

郑良树，1978，《灵根自植》，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页115-120。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页6-216。

庄国土，2010，〈绪论〉，收于庄国土、清水纯、潘宏立编，《近30年来东亚华人社团的新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页5。